

第九课 延福在中国

第八课提到，中国门户开放以后，进入的使者增多，所用的方法各有不同，但都帮助了中国的现代化。这一课承接第八课，谈谈不同的使者在中国延福的具体工作，带给中国的正面影响。

在学习前，我们先来玩一个小组游戏：生命中的最……

每人预备一张纸及一支笔，然后，在纸上写下 10 项自己最珍贵的人、事或物。游戏开始时，以玩石头、剪刀、布的方法，看谁人获胜，便可以选取一位输者纸上的其中一项，移到自己的纸上，输者则在自己纸上删除该项。

在游戏结束后，谁人纸上所写项目最多的为胜。每位参与者要分享自己得到哪一项最高兴，失去哪一项最不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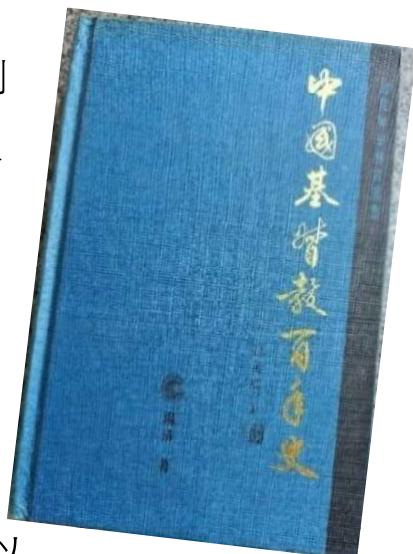
这个游戏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自己看重哪些人、事或物，这可能在我们承担延福使命时会面对的抉择。

现在我们开始本课的研习。

上一课提到，南京条约后，进入中国的使者增多，所用的方法各有不同，其中有注重属灵需要，以传福音为首，开荒布道，深根民众，由下而上。也有以介绍西方现代知识，从文化入手，深信基督教要在中国生根，必须改变中国人的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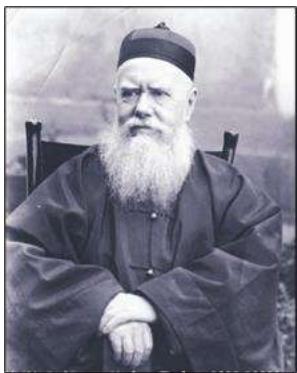
深根民众，由下而上

不少前来的机构，无论宗派机构或是信心机构，都看到当时中国平民百姓的需要，在各方面献上了美好的服侍，值得我们详细探讨，然而因篇幅所限，我们只能聚焦介绍中国内地会的工作和他们的多元化服侍，因为他们是以服务平民百姓为主。然而，这并不代表其他机构没有这样的延福服侍，我们也会介绍其他延福机构的工作。若大家要深入探讨，推荐大家阅读汤清写的《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里面记录了自马礼逊来中国以



至 1905 年的统计，值得参考。

戴德生与中国内地会



为什么选内地会呢？除了上面所说的因素，也因为内地会是全球第一个信心差会，没有宗派的支持，单凭信心仰望上帝的供应，更因为是以中国人为对象。

中国内地会的创立人是大家都认识的戴德生 (James Hudson Taylor)。他 21 岁加入英国的中国传道会，1854 年来到上海，当时正值太平天国与清朝对抗，排外情绪炽热。戴德生虽然面对很多困难，但他深信按上帝的指示去做，必会获得一切的供应。1860 年，戴德生来到中国 7 年后，因为体力耗尽，医生嘱咐他必须回国休息。1865 年，戴德生在英国布莱顿沙滩度假休养，每天祷告，得到一个信念，觉得要为中国人福音需要成立一个特别的机构。于是，他把十英镑存入银行，成立了「中国内地会」 (China Inland Mission, CIM)。没有宗派的背景支持，单凭信心仰望上帝的供应，是全球第一个信心差会。戴德生祈求上主差遣 24 人到中国，因为当时中国内陆仍有 11 省没有福音使者，每一省派遣 2 人，也有 2 人到蒙古去。领受了异象，戴德生在英国等地努力宣讲中国的需要，很多年青人都受到感动，最为人知的有剑桥七杰、富能仁等，他们都是刚大学毕业便到中国来。戴德生也写了一本小册《中国属灵需要的呼声》，指出中国每天有 33,000 人死亡，每年有 100 万人死亡，却没得着基督的救恩。这书道出了中国人的需要，激发了很多人开始关心中国，初版三周便售罄。因为戴德生的推动，参与内地会的使者渐渐增多，有些是带着孩子的年青夫妇，也有不少女性的使者，他们的参与大大激励了信徒的心志。根据内地会的记录，到 1905 年，在中国的使者达 825 位，中国同工增至 1,152 位，中国受洗信徒达 18,625 人，有组织的教会 218 个、宣教站、布道所与会堂合共 424 个，学校 150 所。

内地会使者在中国开拓工作的时期，正值列强侵略的高峰，中国人对外国人充满敌意；稍后，也遇上清朝灭亡、对日抗战和国共内战迭起，岁月艰苦，但使者们都乐意踏上征途，履行使命。尤其在 1920 年代，反教风潮炽热，很多机构都减少人数，但内地会仍征召 200 新使者。至 1934 年，共 1,368 位，人数达到高峰。

使者们的脚踪遍及中国内地，从平原到高山、到人迹罕见的穷乡僻壤，也融入中国人的社会，事事以中国人为先。举几个例子，1867 年因天主教的育婴院被误传虐杀而起的扬州教案，内地会被牵连，房屋被包围纵火，使者受了伤，戴德生怀孕六个月的妻子玛莉亚要跳楼逃生，摔伤了腿，然而内地会并不求助英国领事，只往本地官府报告。1900 年的义和团事件，西方使者的死亡人数以内地会最多，但内地会并不索偿，也不接受政府的赔偿，以自己是中国人来考虑。

1905 年，戴德生来到中国 51 年后，带着对中国人的爱回到天家，在湖南长沙安息，葬于镇江，在他首任妻子玛莉亚和 4 个早年夭折的儿女墓旁。1854 年戴德生带着基督的爱来到中国，他有一句名言至今仍激励着很多人。他说：「假如我有千镑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然而，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他是为基督献上了一生，他的自传《带着爱来中国》，是我们应该要看的书。

中国内地会的服侍

内地会的服侍，以平民百姓为主。为要与中国人认同，融入中国人社会，他们穿汉服，留辫子，宁被谑称为「猪尾宣道会」。他们凭信心度日，不劝募、不举债，藉医疗、教育、戒毒、培育人材等来服侍中国人，也特别关顾少数民族的需要。1866 年，内地会成立后翌年，戴德生等共 24 人乘坐兰茂密号前来(Lammermuir Party)抵达上海，安顿后便前往杭州开拓新的工场，11 月在杭州成立第一个总部，陆续建立礼拜堂、诊所、药房、印刷室，也有同工宿舍。

再一年，1867 年只有一条腿的曹雅直来到温州，翌年，他不仅为温州第一个信徒施洗，也开办了男校崇真小学。1870 年他的太太兴办育德女学，1880 年也开设了温州最早的一家西医院。这样，内地会的工作慢慢在中国内地各地开展。

内地会的医疗服侍

内地会的服侍很多元，布道、建礼拜堂、栽培信徒等，医疗服侍是很重要的一项。看到老百姓的需要，内地会陆续在河南、甘肃、山西、湖南、四川、浙江、江苏、贵州及云南开办医院，也从事培育中国的医疗人员。从 1865 至 1953 年，内地



戴德生纪念墓碑在今镇江

会积极拓展医疗工作，共有 106 名医生，不单单有药房诊所，也兴办医院，至 1905 年已成立了 10 所医院、68 个药房和 50 个戒鸦片所。从 1900 至 1939 年间建立的医院包括：1902 年开封福音医院；1909 年四川保宁福音医院；1909 年山西平阳善胜医院；1914 年山西潞安鸿恩医院；1918 年甘肃兰州博德恩纪念医院、江西鄱阳福音医院；1936 年长沙德生医院。这些医院都是该年代当地唯一的西式医院，多半仍然存在，成为今日各地的人民医院，遗爱至今。

以服侍回民为目标的博德恩医院

以下介绍一所内地会在甘肃兰州开办的博德恩医院，目标是服侍回民，今日已成为兰州市著名的第二人民医院。这所医院是由金品三（George Edwin King）医生一手筹办的。

金品三医生是第二代的使者，父亲金辅仁（George King）1875 年来到中国，在甘肃、陕西和湖北服侍，与妻子邬贵贞（Harriette Black）在工场相遇结婚，是第一对在内地定居的内地会使者夫妇。

1887 年夏末，金辅仁和快要分娩的妻子，在汉江沿岸找房子作传道之用，一直都找不到，金品三就在汉江的行船上出生。

金辅仁在中国十数个年头，感觉中国对医疗人材有极大需要，便趁着回英述职的机会，花了六年时间来攻读医学。返回中国后，在山东烟台几间学校任校医，也在内地会创办的使者子女学校芝罘学校（Chefoo School）担任校医。可惜三年后，因师母身体孱弱，夫妇二人要还乡，金品三也随父母返英。

金品三看着父亲学医的心志，明白中国的医疗需要，也在英国修读医科，预备自己，等待再进中国。1910 年内地会的刊物《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刊登了一篇文章，提到中国最大的需要是医疗宣教士。金品三知道时候到了，于 1911 年回到中国作医疗使者。他先到 1902 年开办的开封福音医院，这医院每年门诊人数破万，却只有两个医生，极度忙碌，而且资源匮乏。在这样的情况下，金品三仍分出时间到乡村布道，因为他铭记着：**来中国不只是要救人，还要救灵魂。**后来，金品三被派至山西的善胜医院，这所医院设有专为戒烟者设立的两个禁烟房，金品三需承担的工作更多。然而，他挂念着回民。



1914 年金品三请缨前往甘肃兰州创建博德恩医院，延续博德恩未完成的使命，并担任第一任院长。博德恩是位美国的富家子弟，神学毕业后加入内地会，预备到甘肃的回民地区，却出师未捷，在埃及开罗学习阿拉伯语时，患上脑膜炎去世。在留下的可观遗产中，25 万美元捐给了内地会，在甘肃兰州兴建医院服侍回民，并以他的名字命名。医院至今仍在，成为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筹建医院从零开始，金品三要负责买地、监工、统筹人事，还要行医治病，幸好有澳洲来的护士夏裕恭（Christina Shaw）相助，其后二人缔结婚盟。

1918 年，博德恩医院竣工，是当时甘肃唯一的西式医院，要支持全省 1,200 万人的需要，但只有几个医护，常有人走上数百哩前来求诊。为此，金品三开展流动医疗传道服务，同时也在不同地区开办医院，履行向外拓展的福音使命。

秉承内地会的目标，也与其他医疗使者的心志相同，金品三坚持培训中国医学生，遂招募了 12 名学生，倾囊相授，更不断鼓舞学生要有传福音的心志，传承使命。然而，在这些功绩的背后，金品三有无数的牺牲。1920 年代非基运动席卷全中国，延福机构纷纷撤退，金品三受命带领甘肃团队转往天津避乱。团队雇了八艘羊皮筏，沿黄河下行至包头，再转往天津，可是羊皮筏全数搁浅。正当金品三把最后一艘受困的筏自浅滩推出时，一道急流将他卷去。终年 40 岁，在中国 16 年。金品三明白服侍不是按自己心意，而是按上帝的心意，延伸上主所赐人的福气。博德恩医院揭幕时，兰州有 300 万回民、13 间清真寺，金品三对各清真寺都发出邀请，各寺也送来贺礼，金品三后来逐一回访。他明白，不同宗教要和谐相处，服侍不分种族，也要关怀不同信仰人士的需要，因为上帝爱所有的人。

金品三和博德恩医院为延福服侍立下了榜样。

少数民族工作—苗族与傈僳族

进入从未听闻福音的中国内地群体，是内地会的第一优先。在中国少数民族中，苗族是最早接触基督教的一个，而最早接触他们的是内地会。

1877 年，内地会的使者巴子成（James F. Brounton）驻在贵阳，接触苗族，1888 年，党居仁（J.R. Adams）接手处理贵州苗族的牧养，1899 年开办了第一间苗族教会。党居仁也于 1902 年向花苗族传福音，成效很好。他也与循道公会的博格理（Samuel Pollard）一同在云南、贵州兴办学校及医院等事工。1905 年，博

格理应苗族一个分支大花苗的邀请，前往贵州石门坎。博格理不但使当地苗民皈依基督教，还建立了一系列的医院、学校和公用设施。他引入各种体育、文化活动，设法改良当地风俗，使石门坎这个偏远苗寨成为西南部最为先进的地区之一。他更获得灵感，与当地老苗民合作，创建了一套书写系统，称为「滇东北老苗文」，至今仍有不少苗民在使用。可惜，1915 年博格理在照顾伤寒病人时不幸染病，自己不肯用药，把药留给染病的苗民，因而亡故。博格理使苗民得到福音，也促进了文明，转化了文化，更得到当局的认同和嘉奖，这正是今日延福的目标。要数全中国最多少数民族居住的省份便是云南，这地区的延福工作也始自内地会。1877 至 1880 年间，麦卡悌（John Mc Carthy）和索乐道（Henry So Itau）、范约翰（John W. Stevenson）细心寻索，开通了往云南的通道。1881 年，花国香（George W. Clarke）夫妇进入云南昆明开设教会，之后陆续有使者来到。

1908年，富能仁从英国皇家学院毕业，加入内地会，22 岁的他来到了云南，加入支持少数民族的福音工作。富能仁在腾越的集市上，遇到了穿民族服装的傈僳族人，觉得很特别，非常感兴趣。同时，他也遇见了克钦、拉祜、德昂等不同的民族，知道他们都未曾听闻福音，便开始深入山区进行探访。



富能仁怀着坚毅之心，筋疲力竭地攀山越岭，遭受饥寒交迫，忍受瘴疠之气和落后的卫生条件，患过肠胃病、疟疾、伤寒等病症。他明白要胜过这场属灵争战只能跪下祷告，更需要持续不懈和数量庞大的祷告。于是他写信给远在英国的母亲，请她招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教会或家中为他祷告。富能仁有这样的这一句话：「宣教的稳固基础是在膝上建立的」。

圣灵动工，好消息来到，先是一、两个信徒信主，再来是一个家庭、两个家庭信主，信主的人渐渐多起来了。富能仁还为傈僳人发明了拼音文字，用这套文字编纂赞美诗集、翻译圣经，并且成立圣经学校栽培信徒。教会就这样逐渐成长、茁壮，基督教成为傈僳族重要的文化内涵。傈僳族人至今都记得富能仁，也在唱颂这些赞美诗，在保山教会为他建立了一个记念碑（见左图），富能仁被称为傈僳使者。

1938 年，富能仁因患脑疟疾，在云南保山去世，年仅 52 岁。富能仁的脚步被迫停下来，但更多的傈僳使者进入当地，傈僳教会在李崇德 (Francis J. Fitzwilliam)、杨思慧 (Allyn B. Cooke)、杨志英 (John Kuhn)、杨宓贵灵 (Isobel Kuhn) 等使者的努力下，继续成长，成为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傈僳族的使者更是不遗余力地，将福音带往一个又一个的山头，甚至翻越国境，传到缅甸、泰国去。



妇女使者—三女侠

除了上述的使者外，还有很多未提名的使者，当中更有不少是女性，有些是随着家庭来的，也有不少是单身女性。原因是当时中国人仍是男女授受不亲，需要女性使者从事妇女工作。根据汤清的《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里记载，1905 年的统计，在中国的延福机构共 63 个，传教师共 3,445 人，其中男的 1,443 人，师母 1,038 人，单身女士则有 964 人，可见女性使者所占比例不低。

中国内地会也是重视妇女工作的一个延福机构，著名的有三女侠之称的盖群英 (Mildred Cable)、冯贵珠 (Evangeline French) 和冯贵石 (Francesca French)。义和团事件后，群英和贵珠二人抵达山西霍州，帮助当地教会向躲在深闺的妇女们传福音，在 1904 年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造福了许多没机会受教育的女子，很多日后都成为福音使者。1908 年二人回英国述职后，贵珠的妹妹贵石跟随她们回到山西。1923 年，三人带着在酒泉收养的孤女爱连，到从未听闻福音的河西走廊去。她们的足迹遍及甘肃、蒙古、新疆等地，在篝火旁、帐篷里，也在军营里，把握任何机会向不同民族传福音。直至 1936 年，西北的军阀禁止外国人进入，三位女侠无奈带着爱连一起回到英国。

像三位女侠一样委身于中国妇女事工的女使者还有很多。在河南，开封医院成立后，也开展妇女医院，和培育中国的医疗同工。此外，还有在山西开办「八福客栈」的艾伟德，也有独立自差到广东的何义思等，都对中国的妇女贡献良多。

教育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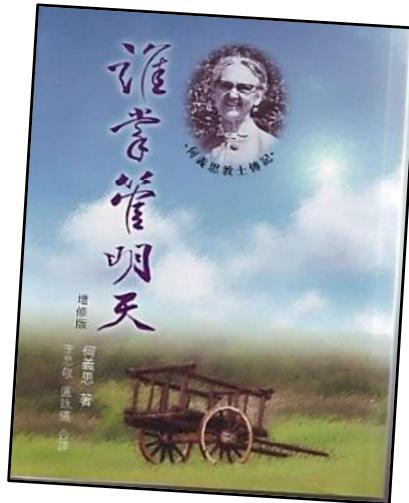
内地会虽然并没有办高等学府，但兴办供一般百姓入读的学校却不少，让很多人

能读书识字。至 1922 年，内地会共办有 4 所幼儿园、375 所初小、58 所高小、5 所中学、1 所学院、5 所师范学校及 21 所圣经学校。信徒不单单识字和学习真理，也懂得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稍后会介绍一些其他机构兴办的高等学府。

其他机构的服侍

信心差会—希伯仑差会

上面提到有不少其他延福机构来到中国，以下介绍建立信心差会的何义思 (Ruth Howe Hitchcock) 教士和她的家庭。何义思是生长于美国的一位年青女性，毕业于史丹福大学。幼年时听了很多延福的故事，10 岁那年听到中国的需要，便立志要到中国来。1915 年抵



达广东南海西樵官山，协助同是来自美国的独立女使者翟恩怜 (May Jackson)。1918 年翟恩怜因身体健康回美，工作便交何义思来掌理。

何义思并没有加入一个机构，她向在美国的父母和亲属募集捐款，成立希伯仑差会 (Hebron Mission)。蒙上帝保守，虽经几番周折，最终买下官山后山的一块地，这个被称为「家庭差会」的机构，就在这片土地上发展起来。(上图是她的传记)

1922 年开始，官山的事工渐渐多元化，包括兴建新的礼拜堂、布道所、小学、女学堂、孤儿院等，也有圣经学校。最值得提的是她创设的「花边馆」。何义思看见很多当地妇女要自食其力，又不识字，所以开设「花边馆」，教导她们制作西方女士衣服常用的花边，目的让妇女一面赚取收入，一面上学，又得以聆听福音。这在中国南方是首创的妇女事工，也正是今日延福机构要学效的营商事工。在一些妇女地位卑微的地区，帮助妇女自食其力，让她们有机会读书识字，从而提高她们在社会的地位，是今日延福服侍所需要的。

此外，希伯仑差会又兴办慈善事业，帮助困苦的人。在沦陷时期收容大批弃婴、难童，渡过抗日的艰苦时刻，也曾遣送青年到广西建道圣经学院就读。1950 年代后，希伯仑差会迁到香港，也从事建立教会和差派工作。

医疗服侍方面

除了内地会努力作医疗服侍外，基于中国人口众多，医疗缺乏，很多机构都从事

医疗服侍。根据统计，至 1889 年，全中国医院共 61 间，诊所 44 间，至 1905 年，医院共 164 间，诊所 240 间。至于在中国的医疗使者有多少，虽然统计并不很完全，但最少男的有 205 人，女的有 93 人，人数也不少。所创建的医院至今仍有很多存在，以下简介其中一些，可以看见西方医疗使者所作的贡献：

1835 年在广州建立的**博济医院**，是全中国的第一所西式医院，是由第一位来华医疗使者伯驾（Peter Parker）所创办的。他是美国公理宗海外传道部(美部会)的使者，被称为以手术刀把福音带到中国的人。

此外，1866 年 9 月 8 日，英国伦敦会在汉口成立**仁济医院**，取仁爱济世之意。1928 年改称协和医院，现今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1890 年代初，美国长老会在淮阴地区开办**仁慈医院**，是当时全球最大的长老会医院，为苏北稠密的农村人口提供质量并重的医疗服侍。1951 年搬新址，今日称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是一所三级甲等医院。

另一方面，使者们也尽心培育中国医疗人材。在女性方面，得到使者协助，其中有康爱德（又名康成）和石美玉两位到美国修读医科，回国后分别创办了江西的**九江妇幼医院**（Kiukiang Hospital）和上海**伯特利医院**（Bethel Hospital）。

博济医院

博济医院是中国第一所西式医院，在中国创下了许多个第一。

1835 年，美部会差派毕业于耶鲁大学医学院的伯驾（Peter Parker）医生来中国，但需要逗留在广州十三行。其后，他得到著名商人伍秉鑒的帮助，在十三行的新豆栏街开设「眼科医局」，不久扩大，更名为「仁济医院」（Hospital of Universal Love）。伯驾医术高明，又关心病患，赢得广州百姓的信任，求诊病人大增。

鸦片战争爆发，医院停业，伯驾回美，并进修医术。战争结束，1842 年 11 月，伯驾和新婚夫人回到中国，仁济医院复业，已不限于眼科，改为综合性医院。

伯驾不但在医术上追求日益精进，更视医疗为布道方式之一。他在进行手术前，详细研究病情外，也重视病人的心理状况，带着病人一起祷告，让病人对上帝也产生信心，然后才进行手术。当痊愈后，再与病人一起祷告感谢上帝，这样，患者不但身体康复，更经历到心灵的更新。

伯驾被称为以手术刀把福音带进中国的医生，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首创多项纪录，

如割除扁桃腺、割除膀胱结石、使用乙醚麻醉、采用氯仿麻醉方法等。而且，在每次手术前后，伯驾都特别请画家详细绘下病人的病状，保存下来，归入档案，供日后的教学及研究参考。当时十三行有一位职业画家关乔昌，西人称他为琳呱（Lam Qua），自愿免费为伯驾画下各种病状，生动的保留病历资料。如今尚有110幅存留下来，分别收藏于英美各大图书馆。

1855年，伯驾蒙美国政府委任为驻华全权公使，仁济医院移交美北长老会的嘉约翰（John Kerr）医生，1859年迁入新址，改名为「博济医院」，今日称为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1866年，嘉约翰在博济医院设立医校，培养本地医疗人材。因为孙逸仙先生曾

入读，所以来后改名为孙逸仙纪念医院。根据《医学堂学生名录》，至1913年共有202人入读，成为西方医学在中国持续发展的力量。同时，截至1935年，编译教学书籍及中文医学出版物共45种。

博济医院促成了广东在中国近代西方医学历史上的多个第一，是：第一家西医医院、第一间西医学校、第一间护士学校，出版第一本中文西医教材、第一份西医期刊，也培育了第一个西医留学生。

中国的西式医疗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发展出来的。

其他宗派机构的服侍—播道会

信心机构以外，也有很多宗派机构，规模比较大服侍达全国的如公理会、圣公会、卫理公会、信义会、浸信会、巴色会等，也有在广东省内服侍的播道会等。

播道会最早称美瑞丹会，是由美国的瑞典裔信徒于1884年组成，目的在美国各地传福音。1885年宽夸伦（H.J. Von Qualen）就读美国芝加哥神学院时，结识了华侨萧雨滋及吴硕卿，立志同赴中国开荒布道，遂于1886年申请往中国。

1887年宽夸伦到了中国广东，第二年即在广州河南设立了第一间布道所，再一年又在瑞仁大街设福音堂，并于1891年附设男校。接着，又开展多元化的服侍，包括办教育、开诊所、施医、赠药、恤孤等救济工作，服侍基层民众。



抗日时期，发展赈灾、儿童福音和医疗事工，又开办多间孤儿院和兴办小学等。传道人材培育方面，1928 年在广州河南基立村开设圣经夜校，1929 年扩建为广州圣经学院，二年后，于广州河南基立村旁购地建圣经学院。

播道会的工作，统计至 1936 年，共开设会堂及基址 13 所、普通教育学校 5 间、信徒共千余人。由于事工渐多，遂在广州建立华南总署，1929 年改称为中国基督教播道会，并以宽夸伦为会祖。

为什么要介绍播道会呢？因为他们灵活地用不同方式宣讲福音。创新的是兴建了一艘福音船，对象是珠江三角洲的艇民、农民、城市基层、妇女儿童，这是一项灵活地切合需要的工作。

中国民风迷信，在广东一带的水上人、妇女尤甚，而觅地建堂又往往为当地官绅所阻，宽夸伦和同工遂计划造船。1895 年宽夸伦回美述职，向母会提出「建造福音船」计划，会众纷纷慷慨奉献。1897 年三水福音堂「启



明号」福音船（图）启用，11 月在沙面举行奉献礼。福音船沿珠江分流北上，深入内陆。日间同工进乡布道及售卖福音书，晚上泊岸宣讲，艇户乡民登船听道的很多。福音进入民间，遂在番禺和增城开拓福音堂。

播道会的同工不墨守绳规，按地区和时势需要，灵活变通，以不同的形式来传讲福音，是今日延福服侍的榜样。

（以上内容可参 https://www.efcc.org.hk/pages/history_china#.YWFMmtpB）

独立自差的例子—小妇人艾伟德

在由下而上传福音方面，最后要提的是有「小妇人」之称的艾伟德（Gladys Aylward）。她因为资格不符合，找不到差派的机构，但服侍中国的心不减，28 岁时独自来华。由于节省旅费，选择由英国坐火车，经东欧，再穿越西伯利亚，旅途充满了艰难和危险，几经转折，最后抵达天津，再转到山西。

在山西阳城县，艾伟德和一位已在当地的使者创办「八福客栈」，作为福音基地，接触贫苦大众。最早接待骡马夫，向他们讲述耶稣的故事，渐渐附近各乡镇都有人相信耶稣。开骡马店、讲故事、唱歌传道，正是艾伟德与众不同的地方。

曾有一次，阳城监狱发生骚乱，一个囚犯突然发狂，挥刀砍死了好几个人，典狱官想起了她，把她请来。艾伟德温柔的劝这囚犯放下屠刀，并保证不再加罪。那凶徒竟然顺从地将手中的刀交给艾伟德，让狱卒押走。此后，典狱官允许她到狱中传福音，并获阳城县长设宴款待。

当时政府推行「天足运动」，明令妇女把缠裹的小脚放开。因为艾伟德的事迹家喻户晓，官员信任她，邀请她现身示范天足的好处，帮助了很多妇女。

艾伟德也接待孤儿。她在街上遇见一个被拐卖到阳城的女孩，开价两银元，最后花了九毛钱把女孩领回，所以女孩小名为「九毛」，学名则为「美恩」。她后来又收养了一些孤儿，包括「少少」、「宝宝」和「兰香」等，继后成立了一所孤儿院。抗日战争时期，山西也逢战乱，得到村民和军人们的帮助，把逾百孤儿迁往后方西安。在后方，艾伟德又进入四川难民营帮忙，也在甘肃救助麻疯病人。

艾伟德一生以服侍中国人为己任，并且入了中国籍。晚年到了香港植堂，再后在台北建立艾伟德儿童之家。

这种独立自差是今日不少使者喜欢采用的方式，但必须注意，艾伟德来到是先与一位已在当地的使者同工，而前面介绍的何义思，她到官山也是协助一位已在当地的使者，二人都是单人勇闯创启地，是有伙伴的。

思考问题

看了以上众多来华的延福使者，我们先停一下，思考一个问题：

这些延福使者为了完成基督的托付，在学业、工作前途、财产处理、迁居等人生抉择上都以服侍为主要考虑。当你为人生的重要事件作出抉择时，你愿意为主摆上吗？在作决定时，会想到上帝给你的延福托付吗？

其他的服侍

思考了以上的问题后，我们再来看看一些使者在改变社会文化上的贡献：

社会运动与延福—戒烟运动与天足运动

使者们也很关注当时中国整个民间社会的需要，特别是能改变社会风气的事，如设立收容从良妓女们的「济良所」，并教以手艺谋生，帮助了很多妇女；而最明显的是戒烟运动和天足运动。

戒烟运动与天招局

清朝末年，鸦片在中国流传，戴德生的妹夫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从事反鸦片活动不遗余力，也担任「反鸦片协会」秘书一职。除他以外，还有很多使者都参与戒烟运动，内地会也有参与。其中有本地人士推动的福音戒烟，席胜魔牧师是成就最显著的一位，他可说是中国从事整全福音的先驱。

席胜魔原名子直，山西临汾人，是一个秀才。清末鸦片销入中国，山西遍植罂粟，抽大烟的人很多，席子直也染上了鸦片毒瘾，弄得倾家荡产。1876 年华北旱灾，灾情连续多年，循道会的李修善（David Hill）等使者来到山西赈灾。为使中国人认识福音，除派发单张，更主办以信仰为主题的征文比赛。席子直为得赏钱帮补生计，参加了征文比赛，获得头奖，规定要亲身领奖。和李修善一见如故，席子直教李修善中文，李修善则教席子直真理，不久，席子直就接受耶稣为救主。他花了一个礼拜时间戒毒，过程痛苦，但靠着深切祷告终于得胜，并改名为胜魔。席胜魔戒毒成功后，决志以福音戒毒帮助患烟瘾的人，遂开设「天招局」，规定每一位戒烟者必须参加聚会，早晚敬拜上帝。因为效果显著，陆续在山西、陕西、河南和河北四省开设了 45 个「天招局」，其中也有一些是专为女性设立的，拯救了许多人的灵魂。1886 年戴德生在山西按立席胜魔为平阳、洪洞、大宁三区的主任牧师，并且在山西洪洞成立基督教道学院，培育本地传道人。1896 年 2 月席胜魔安息主怀，他的事工由内地会延续。

天招局的宗旨与今日福音戒毒的意义相近，给人戒烟、治病，教人信主，并且教他们手艺，让他们做各样的劳工，如推磨、挑水、纺线、织布、缝衣、耕地、木工等，让他们戒烟后重回社会，有一门手艺可以谋生，这与今日延福工作相近。

天足运动

另一个使者极力推动的运动是天足运动。什么是「天足」？是指自然、天生的脚。中国女子有缠足的陋习，明清时期风气尤甚，无论官家小姐或小家碧玉以至乡村妇女，都要缠足，逼得要留在家中。缠足使脚变细小，脚趾畸形，更因为脚小而站不稳，走动艰难，无法外出，更无法劳动，这是很不人道的。

清末首个有历史可考的反缠足组织，发起人是英国使者约翰麦克高望（John Mac Gowan）。1874 年他率先在厦门建立了一个拥有 60 余名妇女的「天足会」，入会

的妇女不得缠足。第二位是随英国商人夫婿来到的立德夫人（Mrs. Archibald Little），看见很多妇女被缠足所拖累，身体和心灵都受到摧残，甚至影响下一代。于 1878 年在上海设立「天足会」，也在不同城市设立分会，并利用广学会出版的书刊宣传。1898 年，卫理公会宝复礼（Frederick Alfred Brown）和公理会丁家立（Charles Daniel Tenney）两位使者，也在天津成立了「天足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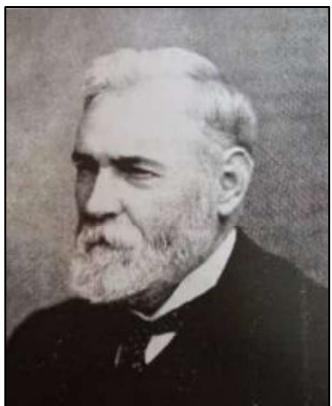
最终，慈禧太后在光绪 28 年（1902 年）下诏废除缠足。这个运动象征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萌发，不只革除一种陋俗，也是近代知识分子思想解放的发展历程。

从上而下，文化革新

此外，有另一些使者认为要从知识分子入手，影响菁英，从上而下。李提摩太、丁韪良、林乐知等几位都在政府作官，从事出版、翻译、办学、教授语文等，目的推动文化革新。他们创办机构、参与政府工作，影响深远。

广学会

其中一个机构是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原名为同文书会，1887 年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于上海成立，发起人不尽是传教士，也包括当时在上海有名的西方人士。1891 年起由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担任总干事，1892 年中文名改为广学会。



李提摩太是英国浸礼会的使者，在中国 45 年。他于 1870 年抵达山东烟台，学习中文，并挨家逐户分发福音单张，发现收效甚微，而且接受福音的人又大多是些贫穷人，影响力不大。所以他试图开始接触上层社会的人，觉得「他们有良好的土壤可撒种」，因此刻苦学习中国儒家典籍和礼仪。

不负苦心，1890 年 7 月，李鸿章聘请他到天津担任《时报》主笔，第二年即 1891 年起担任广学会的总干事，前后达 25 年之久。他更把在《时报》所写的文章汇编成集，题名《时事新论》，共 12 卷，由上海广学会出版。广学会出版了很多书籍，对中国社会的思潮影响都很大，尤其是维新变法。也曾出版儿童期刊《小孩月报》和给妇女的《女铎报》。

广学会标榜「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藉编辑、出版新书、介绍西洋文化、启发民智。为了破除中国人怀疑西人来华存有野心，以

此表明他们前来的动机在于帮助中国富强，通商、传福音实在是利人利己的事。正如李提摩太所说：我们出版书报的主要目的不是赚钱，而是要赚灵魂。

广学会在 1891 年到 1915 年这段期间，是中国最大、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广学会先后发行两大刊物：1.《万国公报》，着重介绍西方最新知识和思潮；2.《中西教会报》，后来改名为《教会公报》，报导中外基督教发展情况。两份报刊均为中国报业史上重要的先驱刊物，并成为日后中文报刊之蓝本。

《万国公报》

来华的使者早于 1868 年在上海创刊周刊《教会新报》(Church News)，由美国南方卫理公会的林乐知 (Young John Allen) 担任主编。1874 年 9 月改名为《万国公报》(The Globe Magazine)。开始时，内容并非宗教性，并于每期扉页上附印有：「本刊是为了推广泰西各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

1883 年曾因经济原因停刊。1889 年复刊为月刊，为广学会的机关报，英文名改为 *The Review of the Times*，仍由林乐知主编，李提摩太和丁韪良等外籍使者参与编撰，售量约四千份。这份刊物供知识分子阅读，另为妇孺印行浅易画报。



林乐知夫妇于 1860 年抵达上海，以上海为基地，开始了长达 47 年在中国的日子，将毕生的黄金岁月，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中国。他先在清政府办的「广方言馆」内谋得英文教习一职，不久又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译书。在这期间，林乐知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了解加深，他反复思考如何使基督教适应中国文化，能在中国广传。因此，林乐知对延福有了新的理念：一要认真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针对中国的文化特点去改造中国；二要把基督教义和受重视的儒家文化相融合，思考如何以基督教文化代替儒家文化；三是以传播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为手段，如教育、医院、出版等，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吸引更多人接受基督教。

故此，他创办《万国公报》，将大量西方知识与科技引进中国。这是在中国发行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份杂志。当时的人称，如果想要了解西方的知识学问，《万国公报》是必读的。

这些刊物，不单介绍了当时先进的科技、学术，也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

兴办教育

外国机构和使者们来中国后，为提高中国人的识字率，纷纷兴办学校，创立了数千所的中学、小学和圣经学院，也兴办高等学府、医学堂等。

他们在中国至少兴办了 13 所教会大学，分别是北京燕京大学、山东齐鲁大学、东吴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杭州之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华中大学、南京金陵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沪江大学、广东岭南大学等。以下简略介绍其中几所：

第一所西式教会大学—登州文会馆

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是今日山东蓬莱的登州高等学堂。美北长老会的倪维思（John L. Nevius）夫妇于 1861 年到达登州后，看到中国妇女缠足又文盲、迷信且愚昧，为使她们有机会受教育，于 1862 年，买下一座残破的观音堂，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在当时的中国北方，这是一项创举。1864 年，倪夫人生病要回乡，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夫妇到达，接替了他们的工作。狄考文夫妇利用原女校校址创办「蒙养学堂」，供男童寄宿。其后增加中学班，又设高等科。1876 年，定名为登州文会馆，1882 年提升为大学程度，中文名仍为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不仅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高等教育机构，更是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当时，文会馆拥有「中国最多和最好的物理、化学仪器设备」。其后于 1904 年，与青州广德书院合并为广文学堂，1909 年，更名为山东基督教大学，1915 年，以「齐鲁大学」作为校名至今。

有多个第一的圣约翰大学

上海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一所享有盛誉的高等教育学府，是在中国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学校，被称为「东方哈佛」。

1879 年，美国圣公会的上海主教施约瑟（S. I. J. Schereschewsky），把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合并为圣约翰书院，1892 年起正式开设大学课程，并且将英语作为最重要的学科教授。1896 年，圣约翰书院经改组、扩建，成立由文理、医学和神学三科组成的大学部，中文名称也正式改为圣约翰大学堂。1905 年，正式升格为圣约翰大学，并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注册。

圣约翰大学建校，在中国教育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包括出版第一份文理综合性大学学报，举办第一场运动会，组织第一个校友会，设立第一个研究生院，

第一次引入考试名誉制和选科制等西方学制，也拥有第一座现代化大学体育馆。

以庚子赔款办的山西大学堂

山西大学堂创建于 1902 年 5 月 8 日，是中国创办最早的三所大学堂之一，其他两所是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和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

义和团事件引来八国联军，是因西方使者被杀、教堂被焚而起的。结果清廷战败须赔偿军费，称为「庚子赔款」，其中部分款项会赔偿教会。事件中，部分中国人表现的愚昧和迷信，引起各西方基督教会关注。浸礼会的李提摩太坚持，要以赔款中的一部分白银，在太原开办一所「**中西大学堂**」以启迪教化，遂向李鸿章提出设立学堂，教育有用之学。同一时间，清政府也计划在各省设立大学堂，山西巡抚岑春煊奉诏办理。在山西，岑春煊将晋阳书院和令德堂书院合并，筹办「**山西大学堂**」。李提摩太与岑春煊多次协商，同意中西大学堂与山西大学堂合并办学，合并之后，一部为中学专斋，一部为西学专斋，即国学学院和西学学院。

1902 年山西大学堂成立译书院，是中国近代大学创办的第二所译书院，以期促进中西文化交流。1912 年改名山西大学校。1918 年确名为国立**山西大学**。

除了这几所大学，由教会兴办和管理的还有不少，包括：由美国卫理公会、长老会、基督会等，于 1888 年在南京建立的金陵大学；由美南长老会、美北长老会于 1897 年在杭州兴建的之江大学；也有卫理公会、美国公理会于 1919 年，把北京一带的三所教会学校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学等等。

专业培训—医科学堂

除了大学，教会机构也兴办医科学堂，如前述的博济医院所附设的**博济医学堂**，是中国第一所西医教育机构。也有**广东女医学堂**，由美北长老会于 1899 年建立，是第一所女子医学院，1912 年改名为私立夏葛医学院，是中国第二所医科大学，1936 年并入私立岭南大学。

第一所医科大学是协和医学堂，1906 年由英国伦敦会与英美其他五个教会合办，1917 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为医学堂的附属医院。

前面也提过，至少有 13 所教会大学和院校，这些学院，分别开办文科、理科、医科、社会教育科、天文科、农科等科系，更有神学科，可以说在各学科领域上为中国培育了数不尽的人材，中国的文化也得以革新，并趋于现代化。

专业服侍（语文教授）



除了兴办教育，提高中国人的现代知识外，也有使者在政府里任职官员，从事语文教导，从今天来说，是专业性的延福服侍。其中最为人熟悉的有林乐知和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林乐知的贡献，已在前面讲述了，现在介绍丁韪良。他是美国长老会差来的使者，很有语言天赋，懂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他在中国生活了 66 年，

先后出任同文馆与京师大学堂两所机构的总教习，当时被称为「中国通」。

清廷因应外交需要，于 1862 年成立同文馆，训练翻译人员，后来逐渐提升为培育国家语言人材的基地。仅就清末民初的外交舞台看，同文馆毕业生担任使臣或驻外公使的就有 7 位。丁韪良在 1869 年应邀教英文、国际公法，后来出任总教习达 25 年之久。职务相当于大学的教务长。为此，他辞任长老会使者，专注于教学，并期盼能藉此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

为「帮助中国认识上帝和上帝永恒的公义」，丁韪良也翻译了美国人惠顿着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是当时最新和最通用的国际法蓝本。1898 年维新运动高潮，清廷设立京师大学堂，是全国最高学府，也是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由丁韪良任总教习，即首席外籍教育顾问。

但丁韪良曾因义和团暴行受困，也因京师大学堂停办，遂返回美国。一年后再来，协助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筹建大学堂。晚年住在北京，创立北京崇实中学（今北京二十一中学），并任首任校长，1916 年因肺炎病逝北京。林乐知一生鞠躬尽瘁为中国的文化革新努力，为的是要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观。

总结

由于李提摩太、丁韪良、林乐知等知识分子由上而下的推动，各类型学校的开办、书刊的出版，特别是利用庚子赔款来办学，改变中国人对基督教的看法。在平民方面，戴德生等使者尽心竭力的服侍，带来全人的福音，信徒也随之而增加。到了 1920 年，领餐信徒已有 366,527 人，而学习信徒则有 806,926 人。也因为兴办圣经学院、神学院来培育中国的传道人，为中国教会未来的发展奠下基础，使中国教会日后能自立、自养、自传，直至二十世纪的家庭教会仍承受着恩典。

1900 年义和团事件发生，机构和教会受创很深，各国来华机构有感于中国的教会必须自立，于是组成「中华基督教会」等联合教会，鼓励中国教会自立。其实

1881 年席胜魔在山西邓村开创的福音堂，已是早期自立自养自传的本色化教会。使者们远涉重洋，不畏险阻，无论从事那一方面的服侍，都是终其一生留在中国，克服文化的隔阂、艰难的语言学习，把自己的黄金岁月都贡献给中国人，甚至死在中国，葬在中国，才造就了今日的中国教会。

这些使者们所处的环境、面对的艰难，与今日在创启地区的延福服侍不相上下。从他们的服侍、他们的心志和对上帝的依靠来看今日的福音工作，特别在创启地区，正是延福使者所要效法的。使者们并不单单着眼于开荒布道，而是以灵活的方式、切合对象的需要、配合实际的环境来服侍，从而把福音带进群众中间。而且，都获得政府认同、群众接受，公开地让人认识基督信仰。

作为二十一世纪基督徒的我们，在创启地区所占比例日增的大环境下，感激这些使者们之余，应如何回馈他们的贡献？如何效法他们的委身？应如何跟随他们的脚踪？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并响应。

上述仅是一鳞半爪而已，从马礼逊于 1807 年来到中国，到 1950 年代使者们要离开中国，期间对中国教会所作的贡献，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实在难以尽述。中国基督教会和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仍有很多可以探讨的地方，作为中国信徒，我们应该怀着感恩的心来发掘。

思考问题

1. 来华的使者，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延福，覆盖整个中国社会，既响应了人的实际需要，也转化了整个群体的文化。我们平日考虑延福工作，会否侧重了某一个向度？这些延福策略及向度，如何扩阔你的眼界？
2. 来华使者虽各有不同，但都热爱延福、身体力行见证基督。今日，无论留在本地或前往海外，我们都是被呼召去延福的人，你认为自己有多热爱延福，有身体力行吗？请为自己评分，10 为最高，你给自己多少分？
3. 在生活上你会如何继续操练，有关爱全人的生命，与人分享永恒盼望？

祷告

延福路任重而道远，挑战重重，会经历挫败，甚至可能为此而失去性命。我们感谢主呼召了很多放眼永恒的延福使者，甚至为此献上一生，为我们建立榜样。求祢继续陶造、带领我们，让我们汲取前贤的经验、承接他们的服侍，我们的生命能被祢使用去祝福万民。阿们！